

一个 90 后的社会人文沉思录

人文的温度

肖亚洲◎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作者简介



肖亚洲，生于1995年8月，现就读于天津市武清区杨村一中文科实验班。2004年底开始涉足杂文写作，迄今在各类媒体发表杂文、时评、随笔等六十余万字。系多家平面新闻媒体专栏作者、主流门户网站特约评论员。曾获得一些知名网络媒体颁发的年度优秀评论员、优秀评论文章等奖项，一些篇目被编入全国性年度杂文时评选。部分作品编入“一个90后的社会人文沉思录”系列公开出版，其中《权力的边界》、《公意的砝码》已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序言

从“标准答案”中突围

周瑞金

我和肖亚洲同学，原本素不相识，从年龄上看，也相隔了半个多世纪。亚洲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我并不是很了解。偶尔，从媒体对90后的描述中，恍惚觉得他们是功课很重、睡得很少，又特别离不开网络的一群人。这样的话，应试压力和网络交往或者构成了双重的隔离栅，让他们远离现实社会，对时事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也有颇多隔膜。

而看到天津的小肖同学送来的他的三本文集，我有几分吃惊了。我知道，这般大的孩子，是出现过一些文字爱好者的，但大多是偏文学类的，写写小说、散文，而肖亚洲的偏好，与众不同，他所写的，都是新闻评论，或者如他自己所言，是有时评风格的杂文。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在课余时间所写的文章，对时事关注维度之广，写作频率之高，思维之活跃，批判精神之强，都颇出乎我的意料。特别有一些他涉足的题材，对一个大城市的高中生而言，相距很是遥远，但他仍然乐于关注，写起来也有模有样，体现出相当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比如像《农作物为何总按官员意志生长》、《“百强县”评选，荣誉如何批发零售》、《他们生产谎言，我们假菜相信》、《摩天大楼承载不起华西村的转型期许》……亚洲关注、评论的许多话题，都是时下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热点、焦点、难点，超出了一般中学生的知识范畴。但是亚洲的时评，并不比习见的报章或网络时评逊色，倘若不是特别说明，也看不出是出自一个高中生的手笔。透过这些关怀公共政策、批判公共事务的文字，时时可以感受他的独立思考精神、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和公民的道义担当。

比如，关于华西村造摩天楼，亚洲这样评点：“经济学界有一个‘摩天楼指数’的概念，摩天大楼看上去是经济繁荣的象征，但实际情况是，每当有摩天大楼建成之时，都是经济行将衰退之日。其本质是实体经济转型困难、吹大虚拟泡沫的表现。任何地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都会出现制造业转移的现象，使得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制造业应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型升级，但华西村积累的巨额财富，却走向了炒楼、炒金，这其实是产业发展困境的一种表现，实业经济面临升级却失去了方向，于是一头扎进虚拟经济……”

我们姑且不去判断整件事情的是非，单就亚洲的评点来看，他应该是读过一些经济学方面的书刊的，对华西村造摩天楼的分析，虽略显简单直接，在逻辑上却也站得住。一个在校高中学生，能够这样持续地关注并质疑现实问题，立论敏捷且言之成理，是难能可贵的。

在我看来，亚洲最让我感慨的，还不是他的才情，而是他在认识国情、吃透国情方面的不懈努力，是不依不饶的批判精神，是他对公权力习惯性地保持着的批判性质疑的姿态。而批判精神又一直是知识界所企盼的理想性格，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一种令人仰视的品格。

亚洲的这种姿态，让我很欣慰。

看来，在青少年人中间，尽管面对无数需要背诵的“标准答案”，尽管他们被告知只有对教科书亦步亦趋，才能在升学中有一个美好的前景，尽管学校和老师也时常有意或无奈地提醒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中仍然有人从中国学校教育对思想的制度性、系统性甚至是惯性的束缚中，突围而出，以年轻人天然的、阳光般的敏锐和颖悟，烛照现实中的种种假恶丑。

亚洲的努力，让我想起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临终前的尖锐发问，剑指中国教育事业之弊，并非一两句话就能给出“标准答案”。但是，有一点是颇具共识的，杰出人才就是富有创造性的人才，而我们的教育在很多方面，却长年累月地做着束缚孩子们创造性的“工作”。

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其实，不独是科技人才，包括社会人文方面，也没有“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朋友的孩子，在背历史答案，而那些对历史事件原因解释显得极其机械而且教条的答案，和对答案的记忆方式让我很是吃惊：这样的学法和考法，怎能让孩子学会辩证地看待视角丰富的历史？怎能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怎能养成敢于追问真相、还原真相的知识分子品格？如果我们今后缺乏这样一批公共知识分子，这方面的缺憾并不小于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匮乏。

曾经有一个小学生，在写关于“春天”的作文时，没有表示赞美，而是表达了厌恶，说春天太冷、风大，又是细菌和病毒极易流行的季节……结果，这篇说真话的、和别的学生“唱反调”的作文，被批了零分。

这样的教育，如何可能鼓励发明创造？钱学森自诉，他的创新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美国的大学教育：敢于挑战权威，鼓励提出与众不同的创见，更有浓厚的学术氛围与竞争气氛。而钱老一生恐怕是唯一的败笔——1958年“大跃进”时期，他在《人民日报》撰文，用科学的语言证明亩产万斤完全可能，且远未封顶，为举国狂潮又添了一把火力极旺的“科学”之柴——正是缺失了独立思考的结果。想来，这位老人在痛定思痛之后，对教育痛下针砭，也是对一生得失的反思结果吧！

可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难道我们还要仰仗西方教育来培养中国的顶尖创新人才和领军人物吗？

话说得有些远了。谈这些，是因为我对肖亚洲充满期许，希望他能在中国应试教育中，幸存一些创造能力，甚至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创新人才”，他无疑具有这方面的潜质。毕竟是谈亚洲的书稿，我就拉回来再说说亚洲的作品。

如果用钱学森的标准来衡量，亚洲的作品固然让人惊喜，但也不无遗憾。我并不在意亚洲这样一些弱点，比如评论的层面还比较单一；比如文字还可以更加精致流畅；比如有时滥用双引号……这是初学者的一些问题，相信会随着亚洲的成长、学养的加

深，而慢慢改善、提高。

中国并不缺少时评作者，缺的是入木三分的真知灼见。亚洲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接下去的发展还有各种可能性，甚至也不一定非要盯准与传媒有关的专业。希望亚洲能降低一些写作时评的频率，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阅读、行走与思考中。更多阅读，是因为在他这个年纪，还不急着输出，更需要吸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更多行走，见多，才能识广，才能更切实地触摸并体验国情；给自己思考的时间，则是创新的过程……而我还有一点现实的担忧，高考在即，或许亚洲还是应该更多地准备大学的“敲门砖”，争取去一所适合自己的、层次也较高的大学深造。

我一开始说过，我和亚洲的年龄相差半个多世纪。从新事物、新语汇、新思想方面来说，亚洲可以是我的老师。所以，我说的这些，很可能是隔靴搔痒，只是给小友亚洲提供一个老人的视角，听之，并不一定任之。

祝愿亚洲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2012年清明节写于上海

（作者系《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皇甫平”系列评论主要参与者，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第一篇 人文关怀..... 1

人文精神的主旨是对人的生命关怀、生存关怀、权利关怀、道德关怀、终极关怀、自然环境关怀，这是先进的科技、严格的法律都不能替代的社会精神财富。突出对人性的尊重，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要远比对公民的说教更有效、更治本。一个不知羞耻、忏悔、公正、宽容和同情的社会，必然是个毫无内聚力和希望的社会。

悲悯情怀叩不开坚固的利益“心门”	3
“蜷缩”的权利	7
挥不去的排斥，回不去的家乡	10
有一种排外方式叫“捣鸟巢”	14
城市的“仨瓜俩枣”	18
当田园风光遭遇权力美学	21
讨薪的创意	25
农民工与贾府的奶母	29
我们关注改名，农民工关注讨薪	33
奥迪 A6 的阔绰与农民工的寒酸	37
春运悲情背后的深意	41
“陪衬”的愤怒	44
下跪的教授	48
沉重的“一跪一哭”	52

韩正市长的大实话	55
只统土地，不统农民	58
“人民需要拆迁”	61
李小虎们向上流动的困境	66

第二篇 人文批判

人文精神之丧失，缺乏必要之自省，使某些当权者日益顽劣，变成什么也听不进去的“坏孩子”。而一个没有人文情怀的政府，可能异化为一架冷冰冰的官僚机器；一个没有人文关怀的官员，有可能变为没有人性的冷血动物；一项没有人文底色的公共政策，则必然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政策。只有大面积缺失的人文精神渐渐回归，和谐社会才有望渐行渐近。

捞钱的城市化	73
“××安全”，不能总是老百姓的问题	77
权力先吃	81
以身殉酒	85
弱者的武器	88
只有刁官，没有刁民	91
官员的习惯性负面想象	95
民生多艰，无碍观瞻	100
欺民的“过客”官员	104
百姓怀旧还是权力冲动	108
他们生产谎言，我们假装相信	111
寒酸的校车，豪华的公车	115
“被和采”与“被上楼”	119

第三篇 人文寻思..... 123

社会在持续，生活在继续，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人文素养含量被批量式剔除，或持续降低，那就和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毫无关联。如果将此持续和继续状态称之为“发展”，就需要为此定性：退步的“发展”，反动的“发展”，危险而耻辱的“发展”。失落人文精神的“发展”，叫“发癫”。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才是“发展”的主心骨，忽视这一点，“发展”就会异化。

城市化的正轨与歧路	125
西部“引擎”之争	130
资本逻辑下，老婆和政令都是弱者	134
浮躁时代的一副清凉剂	138
犯了白培中家的“侠盗”	142
资本逻辑下的癌症村见怪不怪	146
当低估农民智商成为一种习惯	150
心灵财富的标尺	154
非常幸福与非常不幸福	157

第四篇 人文追问..... 161

转型时期呈现的中国社会“世俗化”图景，在相当程度上修改了大众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功利主义、精神文化世俗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构失衡等日益严重。当前社会最为缺乏的不只是甚至不是经济资本或物质资源，而是急需又不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来的社会文化资源和道德资本。文明秩序的建构需要规范和制度，更需要价值和精神。

三亚的“铁锤”砸出什么	163
韩进式悲剧	166
“幸福指数”这把糖果	169
“民生痛苦指数”是一瓢醒脑凉水	173
评论建筑物好坏，谁在听小老百姓愿望	176
伪时尚的素食主义	180
家家都有丑，捂住是好手	184
喜鹊般的数据	188
有一种治理效应叫“自行”	191
户籍的辫子	195
一不小心成皇帝	198
“警车开道”与“闲杂人等”	202

后记	205
----------	-----

第一篇

FIRST ARTICLE

人文关怀

人文精神的主旨是对人的生命关怀、生存关怀、权利关怀、道德关怀、终极关怀、自然环境关怀，这是先进的科技、严格的法制都不能替代的社会精神财富。突出对人性的尊重，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要远比对公民的说教更有效、更治本。一个不知羞耻、忏悔、公正、宽容和同情的社会，必然是个毫无内聚力和希望的社会。

悲悯情怀叩不开坚固的利益“心门”

人口及围绕人口流动而产生的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在户籍制度仍然主导城市与人口有关的社会事务的背景下，内外有别，是很难实现自我改良和自我革命的。打破这种差别不能任由公共知识分子年复一年奔走呼号，不能指望城市良心发现，而要从国家层面统一施政。

《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南香红近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很多农民工在城市拼搏的最终目标，是要敲开厚重的城门，这个城门一方面是制度之门，另一方面是城市人的心门。她表示，城市的制度并非公众所能解决，但至少我们能逐渐消除与农民工心灵上的隔阂。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要有真诚的尊重、理解和同情，人们必须学会谦虚地面对这一群体。

作为一个完成了农民工问题系列调查，曾参与策划“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大型调查等专题研究的学者型记者，南香红发出了“打开心门，谦虚地面对农民工群体”的肺腑之言，我们应该向这样的情怀致敬。其实不只是南香红，近几年秦晖、于建嵘、李实等公共知识分子，怀着悲悯情怀望着那些“漂移”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农民工，发出了大声的呐喊。这样的呐喊或许不像当年的鲁迅那些犀利，也不

像遇罗克等人那般悲怆，它却以更为绵延的方式，为解决底层问题鼓与呼。

三十年了，在城市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在机器轰鸣的车间、在灯红酒绿的宾馆饭店、在人声鼎沸的菜市场，在家政服务大军中、在城市马路的清洁大军中，甚至在通衢陋巷的收垃圾大军中，到处都有他们或青春飞扬，或中年持重，或老态龙钟的身影。为争取一个与其贡献相符，与国家发展水平相符，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相符的城市待遇，或一个明确的城市身份预期，让他们有机会身体依附于城市、精神归属于城市、文化归化于城市，公共知识分子们一直以关注人性、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人道主义情怀，或秉笔直书，或拍案而起，或反复追问。

农民工进城三十年后的今天，基本状态仍是卡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进了城市，解决不了市民身份，与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福利无缘；回到农村，他们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我们执政党的党旗是镰刀加锤子的组合体，寓意工农联盟，微妙的是，具体到个体的人，当农民和工人结合为一体，就处于尴尬待遇了。同在一个国家体制之下，他们同国不同命；同在一个城市里，同城不同身；同从事一项工作，同工不同酬。

农民工受到了普遍性的不公平待遇，在福利、劳保、就医、教育、养老等各个方面，他们顺理成章地得不到照顾，甚至成为挤占城市有限资源的“罪魁祸首”。谁也无法否认，城市和社会财富的创造中，很大部分有农民工的血汗。一方面在产业转型尚未完成的当下，城市其实很难离开农民工；另一方面当民工如潮般涌向城市，城市却表现

出一贯的傲慢，甚至连农民工因讨不到工资而被迫跳楼跳桥也被指为作秀。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最大的不公，莫过于一方面剥夺了其应有的财富分配，另一方面给其贴上某种羞辱性的身份标签。

农民工绝大部分被纳入中国城市化率的统计，但却一直保留着农民的身份，没有享受过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一提到均等化的服务保障，就等同于政府要进行更大力度的资金投入，挤占城市有限的公共资源，对原有城镇居民和城市发展带来影响。短期来看，均等化服务不一定会给本地带来好处，对提高政绩并无立竿见影之功，这使得地方政府都难免会捂紧口袋。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实质上是财富分配失衡、利益不能共享，是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之间的矛盾。

悲悯情怀成为当今社会的奢侈品，但是，悲悯情怀能叩开城市人的“心门”吗？丰厚的户籍红利，使得城市居民能继续垄断劳动力的高端市场，并将这种制度性优越感渗透到思想与行为选择之中，以人为的理由反对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甚至影响孩子的思想与行为。例如，在广州市某次“小市长”竞选征文中，不少中小学生认为要限制外来人口流入广州，甚至认为要定期遣返部分外来人口。许多地方政府事实上视民工讨薪为不安定因素，仅靠悲悯情怀，消融不了坚固的利益坚冰。叩不开利益铸就的坚固“心门”。

有报道说，在日本大都市里看不见农工”的身影。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万农民工进入城市，转入非农产业部门工作。与中国今天的情形类似的是，当初日本的农民工也面临着从工资到保险与城市工待遇不平等的问题。但日本用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农民工的转型。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我们每年也有大量的农民工涌入

城市。为什么二三十年过去，日本能够成功完成“农民工”转型，而我们却问题较多？也许由于国情不同，他国我们不能照搬，但分析其转型过程，其中的一些制度颇能给人启示。比如，日本就没有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户籍管制。

人口及围绕人口流动而产生的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在户籍制度仍然主导城市与人口有关的社会事务的背景下，内外有别，是很难实现自我改良和自我革命的。打破这种差别不能任由公共知识分子年复一年奔走呼号，不能指望城市良心发现，而要从国家层面统一施政。农民工城市化的瓶颈是户籍制度与福利制度的剥离。破除公共服务属地化管理，实现国家层面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务之急。现在是从国家层面妥善解决体制分割、相关制度整合、公共资源配置等问题，为全国推进城乡统筹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条件的时候了。

（原载 2012 年 1 月 9 日南方网“南方时评”）

“蜷缩”的权利

千千万万乘客春运途中只剩下“蜷缩权利”——爬着上车、“蜗居”一角，年复一年，他们除了忍耐尊严尽失的愤怒，做出过啥大文章，又能做啥大文章呢？

网民对新的“解决春运难时间表”不买账，甚至翻出过往相关新闻，来指责铁道部就解决春运难的时间一再改口。铁道部一位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不赞同“铁道部在忽悠人”的说法，“希望大家能看到我们一直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难题，也希望媒体和个别人不要利用一些字眼的区别来大做文章。”

被公众和舆论轻轻摸了一把“老虎屁股”，春运开锣的前一天，铁道部出来“跺了一脚”。平心而论，两亿多人次的春节大迁徙，使得“春运”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不敏感都难。在这种特殊的情境语境下，我没觉得公众的质疑有多大不妥，人们在“一票难求”问题上的期待，很大程度上是铁道部门一次次的空头承诺催生的。

以一己之经验，我断定面对这个多少有些尴尬的话题，面对春运期间规律性的汹汹民意，相关部门最好的姿态是“多听少说”，或者“只解释、不评论”，委屈归委屈，谁让你是全国人民的铁路而非私人大资本家控制的铁路公司呢？